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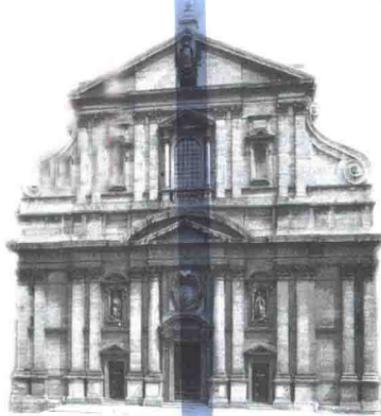
世界散文名著

世界散文名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世界散文名著



中国套盒

—致一位青年小说家

[秘鲁]巴·略萨 著

赵德明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套盒：致一位青年小说家 / (西班牙)略萨著；赵德明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世界散文名著丛书)

ISBN 7-5306-2823-2

I. 中… II. ①略… ②赵… III. 长篇小说-文学评论-
西班牙 IV. I55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6718 号

©Editorial Planeta, S. A., 1997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3.75 插页 4 字数 75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600 册 定价：8.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一组涉及文学话题的随笔。作家以文学“起源于反抗情绪”为立论的出发点，对长篇小说的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提出了系统而富有创见的见解。由于作者本人即是大师级的长篇作家，因而在援引诸如塞万提斯、福楼拜、雨果、海明威、卡夫卡、福克纳等等一系列古今名家的上百部作品时，常能左右逢源，有感而发，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它没有一般评论文章那种臃肿、沉闷的文风，相反，文中处处是妙趣横生的寓言、比喻、幽默，常令读者忍俊不禁。作家认为“一篇评论文章本身即是一部创作，丝毫不比一部优秀小说或长诗逊色”，可以说本书正是这一见解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本书对创作或解读小说艺术确有指点迷津的价值，读者也一定会珍爱有加并多有受益。

译者的话

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作品早在80年代初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了。到目前为止,已经译成中文的书有:《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胡利亚姨妈与作家》、《世界末日之战》、《潘上尉与劳军女郎》、《水中鱼》、《谎言中的真实》、《狂人玛伊塔》、《谁是杀人犯》等。在喜爱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中,巴尔加斯·略萨的名字是不陌生的。为了进一步加深对这位在当代西方文坛上享有盛誉的作家的了解,译者把他1997年5月完成、10月由西班牙行星出版社出版的《致一位青年小说家》的中译本奉献给我们的读者。

《致一位青年小说家》是一部专门谈论小说创作才能和技巧的书。它用书信的形式介绍了作者对于小说创作中一系列关于技巧和形式方面的基本问题所做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见解。这是一项“基本建设”工程,好比盖房子,如果地基没有打牢固,地上的建筑物就埋伏着随时倒塌的危险。巴尔加斯·略萨在这本书中谈及的语言风格、时间、空间视角、不同的现实层面以及许多技巧变化都属于小说创作的“基本功”。为了说明“基本功”的重要性,他广征博引,塞万

· 中国文坛 ·

提斯、福楼拜、雨果、海明威、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罗伯·格里叶、维吉尼亚·吴尔夫、胡安·鲁尔福等八十多位世界著名作家近百部作品在这里出现。大作家谈大作家的创作之所以生动有趣，原因之一就是作者时时用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作为潜在的参照系数，两相比较，常常会比出不少新的见地。比如，作者在强调“基本功”重要的同时，丝毫没有忘记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关系：艺术形式的最高境界是读者完全被内容说服了，而全然“忘记”或者“没有感觉到”艺术形式的存在。这类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在书中处处可见。

巴尔加斯·略萨刚刚过了花甲之年，以文学创作论，他正处于黄金岁月：激情尚在的同时（1997年还完成了爱情小说《情爱笔记》），心气正逐渐走向平和，因为他已经功成名就了。现在支撑着他走完人生最后道路的就是文学创作了。所以他在这部《致一位青年小说家》中说：“我敢肯定的是：作家从内心深处感到，写作是他经历过和可能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因为对作家来说，写作意味着最好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巴尔加斯·略萨还会继续写作下去。当然也有可能写出更动人、更深刻的作品来。至于哪一年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看法是：“给作家发奖……有着极其随心所欲的独特走向，因为这些东西常常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们。”

赵德明

1998年12月17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目 录

译者的话	赵德明 1
一 绦虫寓言.....	1
二 垂头的长颈怪兽	12
三 说服力	21
四 风格	26
五 叙述者空间	35
六 时间	50
七 现实层面	63
八 变化与质的飞跃	76
九 中国套盒	86
十 隐藏的材料	94
十一 连通管.....	104
十二 权作信后附言.....	112

一 绿虫寓言

亲爱的朋友：

您的信让我感到激动，因为通过这封信，我又回到了自己十四五岁的年月，那是在奥德里亚将军独裁统治下的灰色利马，我时而因怀抱着总有一天要当上作家的梦想而兴奋，时而因为不知道如何迈步、如何开始把我感到的才华付诸实施而苦闷；我感到我的才华仿佛一道紧急命令：写出让读者眼花缭乱的故事来，如同那几位让我感到眼花缭乱的作家的作品一样，那几位我刚刚供奉在自己设置的私人神龛里的作家是：福克纳、马尔罗、多斯·帕索斯、加缪、萨特。

我脑海里曾经多次闪过给他们写信的念头（那时他们还都健在），想请他们指点如何当上作家。我从来没有敢动笔，出于胆怯，或者可能是出于压抑的悲观情绪——既然我知道他们谁也不肯屈就回信，那为什么还要写信呢？——这样的情绪常常会白白浪费许多青年的才华，因为他们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学算不了什么大

· 中国文论 ·

事，文学在社会生活的边缘处苟延残喘，仿佛地下活动一般。

您既然给我写了信，那您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压抑。这对于您愿意踏上冒险之路以及为此而期盼的许多奇迹是个良好的开端——虽然您在信中没有说，但是我可以肯定您是寄希望于奇迹的。请允许我斗胆提醒您：对此，不要有过高期望，也不要对成就抱有过多幻想。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说您不会取得成就；但是，如果您坚持下去，不断地写作和发表作品，您将很快发现，给作家发奖、公众的认可、出售作品、社会声誉，有着极其随心所欲的独特走向，因为有时这些东西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而偏偏纠缠和轮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这样一来，凡是把成就看做对自己才华的根本鼓励，那就有可能看到梦想的落空，并且有可能把文学才华与为获得文学给予某些作家（为数极有限的几位）闪光的奖牌和经济利益所需要的才能混淆起来。前者的才华与后者的才能是不同的。

文学才华的主要属性可能是，有才华的人就得以运用这一才华作为最佳奖赏，这样的奖赏要超过、远远超过他作为创作成果所获得的全部奖励。对于文学才华问题，我有许多不敢肯定的看法，但是我敢肯定的看法之一是：作家从内心深处感到写作是他经历过和可能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因为对作家来说，写作意味着最好的生活方式，而不顾及通过他写出的东西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结果。

我觉得才华是谈到令人鼓舞又令人苦恼的这个话题必须的出发点：如何才能成为作家。当然，这是个神秘的题目，

它被包围在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中。但是,这并不构成用一种理性的方式试图加以说明的障碍,只要避免好虚荣、带有信教和狂妄色彩的神话就可以进行;浪漫派一度怀抱着这一神话,把作家变成众神的选民,即被一种超自然的先验力量指定的人,以便写出神的话语,而借助神气人类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升华,再通过与大写的“美”的感染,人类才有可能得到永生。

今天再也不会有人这样谈及文学或者艺术才华了;但是,尽管现在的说法不那么神圣或者辉煌,才华依然是个相当难以确定的题目,依然是个起因不详的因素;才华推动一些男男女女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一种活动中去:突然有一天,他(她)们感到自己被召唤,甚至身不由己地去从事这一活动,因为他(她)们直觉地感到:只有发挥这一才华——比如写故事——,根据自己的条件倾其所有,才会感到实现了自我,而丝毫不觉得是在浪费生命。

我不相信人的诞生是早在妊娠期就由命运安排妥当的,什么由于偶然或者任性的神意在新生命中分配才干、无能、欲望和无欲的结果。但是,今天我也不相信我青年时有个阶段在法国存在主义唯意志论的影响下——尤其是萨特的影响——曾经相信的东西:才华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决定人未来的个人意志的自由冲动。虽然我认为文学才华不是刻在未来作家基因上的某种预示性的东西,虽然我也坚信遵守纪律和坚持不懈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产生天才,最终我还是确信:文学才华不能单单解释为“自由选择”。对我来说,这个选择是必要的,但那仅仅是第二阶段的事情,从那

第一个主观、先天或者童年和少年起就培养起的条件开始，那理性的选择在逐渐加强这最初的条件，而不是从头到脚加以制造。

假如在我的怀疑中没有搞错（当然，更有可能我搞错了目标），一个女人或者男人在童年或者少年时期过早地施展了一种会想象人物、情节、故事、与人们生活的世界不同天地的“才能”，这种爱好就有可能是后来的所谓文学才华。当然，从这样一个喜欢展开想象的翅膀远离现实世界、远离真正生活的倾向，到从事文学生涯，这中间有个大多数人不能跨越的深渊。能够跨越深渊、通过语言文字来创造世界的人们，即当上作家的人，总是少数，他们把萨特说的“一种选择”即意志冲动补充到这个条件或者爱好之中了。他们自己选择了自己。作家们为着把自己的才华转移到语言文字上来而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从前这种才华只限于在无法触摸的内心深处虚构别人的生活和世界。这就是您现在的处境：困难而又激动的处境，因为您必须决定除去凭借想象虚构现实之外，是否还要把这虚构的现实落实到文字上。如果您决定这么做了，那您就已经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当然，这丝毫不能担保您将来一定当上作家。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只要按照这个计划安排自己的生活，那就是一种（唯一的）开始当作家的方式了。

这个会编造人物和故事的早熟才能、即作家才华的起点，它的起源是什么？我认为答案是这样的：起源于反抗情绪。我相信：凡是废寝忘食地投入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了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

批评、对现实世界的拒绝和批评以及用自己的想象和理想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那些对现状和眼下生活心满意足的人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创作虚构现实这样虚无缥渺、不切实际的事情中去呢?而运用这个简陋装置创作别样生活和人群以便反抗现实生活的人,有可能是在不计其数的理由推动下进行的。这些理由或者是利他主义的,或者是不高尚的,或者是慷慨豪放的,或者是吝啬卑劣的,或者是纷乱复杂的,或者是平庸简单的。这个对生活现实提出根本质问的种类如何,是无关紧要的,依我之见,这样的质问是跳动在任何一个写匠心中的。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和彻底,仿佛要通过这一手段来保持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这个手段就是用虚构的敏锐和短暂世界以虚幻的方式代替现实生活这个具体和客观的世界。

但是,尽管这个事情不切实际,它是以主观、形象、非历史性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后会在现实世界中、即有血有肉的人的生活里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对现实的这一怀疑态度,是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是文学才华存在的理由——,决定了文学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一个特定时代的唯一证据。虚构小说描写的生活——尤其是成功之作——绝对不是编造、写作、阅读和欣赏这些作品的人们实实在在过的生活,而是虚构的生活,是不得不人为创造的生活,因为在现实中他们不可能过这种虚构的生活,因此便心甘情愿地仅仅以这种间接和主观的方式来体验它,即另外一种生活:梦想和虚构的生活。虚构是掩盖

· 中国春盒 ·

深刻真理的谎言；虚构是不曾有过的生活，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男女渴望享有、但不曾享有、因此不得不编造的生活。虚构不是历史的画像，确切地说是历史假相的反面，或者历史的背面；虚构是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正因为如此，这些事情才必须由想象和话语来创造，以便安抚真正生活难以满足的野心，以便填补男男女女在自己周围发现并且力图用自己制造的幻影充斥其间的空白。

当然，反抗情绪是相对的。许多写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情绪的存在，或许还有可能他们弄明白了自己想象才能的颠覆性质之后，会感到吃惊和害怕；因为他们在公开场合绝对不认为自己是爆炸这个世界的秘密恐怖分子。另外一方面，说到底，这是一种相当和平的反抗，因为用虚构小说中那触摸不到的生活来反抗实在的生活，又能造成什么伤害呢？对于实在的生活，这类竞争又能意味着什么危险呢？粗略地看是没有的。这是一种游戏。不是吗？各种游戏只要不企图越过自己的空间、不牵连到实在的生活，通常都是没有危险的。好了，如果现在有人——比如，堂吉诃德或者包法利夫人——坚持要把虚构小说与生活混淆起来，非要生活像小说里那个模样不可，其结果常常是悲惨的。凡是要求这么行动的人，那往往要以可怕的失望做代价。

但是，文学这个游戏也并非无害。由于虚构小说是内心对生活现状不满的结果，因此也就成为抱怨和宣泄不满的根源。因为，凡是通过阅读“体验”到伟大小说中的生活——比如上面刚刚提到的塞万提斯和福楼拜的作品——的人，

回到现实生活时，面对生活的局限性和种种毛病，其感觉会格外敏感，因为他通过作品中的美妙想象已经明白：现实世界、这实在的生活比起小说家编造的生活不知要庸俗多少倍。优秀文学鼓励的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焦虑，在特定的环境里也可能转化为面向政权、制度或者既定信仰的反抗情绪。

因此在历史上，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不信任虚构小说的，对它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甚至在长达 300 年的时间里禁止整个美洲殖民地出售小说。其借口是：那些胡说八道的故事会分散印第安人对上帝的信仰，对于一个以神权统治的社会来说，这是唯一重要的心事。与宗教裁判所一样，任何企图控制公民生活的政府和政权，都对小说表示了同样的不信任，都对小说采取监视的态度，都使用了限制手段：书刊检查。前者和后者都没有搞错：透过那无害的表面上看，编造小说是一种享受自由和对那些企图取消小说的人——无论教会还是政府——的反抗方式。这正是一切独裁政权——法西斯、伊斯兰传统派政权、非洲和拉丁美洲军事独裁政权——企图通过书刊检查强迫文学穿上拘束衣来控制文学。

但是，这样泛泛的思考让我们有些脱离了您的具体情况。咱们还是回到具体问题上来吧。您在内心深处已经感觉到了这一文学倾向的存在，并且已经把献身文学置于高于一切的坚定不移的行动之中了。那现在呢？

您把文学爱好当做前途的决定，有可能会变成奴役，不折不扣的奴隶制。为了用一种形象的方式说明这一点，我要

告诉您：您的这一决定显然与 19 世纪某些贵夫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她们因为害怕腰身变粗，为了恢复成美女一样的身材就吞吃一条绦虫。您曾经看到过什么人肠胃里养着这种寄生虫吗？我是看到过的。我敢肯定地对您说：这些夫人都是了不起的女英雄，是为美丽而牺牲的烈士。60 年代初，在巴黎，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名叫何塞·马利亚，是个西班牙青年，画家和电影工作者，他就患上了这种病。绦虫一钻进他身体的某个器官里，就安家落户了：吸收他的营养，同他一道成长，用他的血肉壮大自己，很难、很难把这条绦虫驱逐出境，因为它已经牢牢地建立了殖民地。何塞·马利亚日渐消瘦，尽管他为了安抚这个扎根于他肠胃的小虫子不得不整天吃喝个不停（尤其要喝牛奶），因为不这样的话，它就麻烦得你无法忍受。可他吃喝下去的全部都不是为了满足何塞的快感和食欲，而是让那条绦虫高兴。有一天，我们正在蒙特巴纳斯区的一家小酒吧里聊天，他说出一席坦率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咱们一道做了许多事情。看电影，看展览，逛书店，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谈论政治、图书、影片和共同朋友的情况。你以为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和你一样的吗？因为做这些事情会让你快活。那你可就错了。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它，为这条绦虫。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现在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是为我自己生活，而是为着我肠胃里这个生物，我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奴隶而已。”

从那时起，我总喜欢把作家的地位与何塞·马利亚肠胃里有了绦虫以后的处境相比。文学才能的使用不是消遣，不是体育，不是茶余饭后玩乐的高雅游戏。它是一种专心致

志、具有排他性的献身，是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奴隶制——让它的牺牲者（心甘情愿的牺牲者）变成了奴隶。如同我那位在巴黎的朋友一样，文学变成了一项长期的活动，成为某种占据了生存的东西，它超出了用于写作的时间之外，渗透到了其它所有事情之中，因为文学才能是以作家的生命为营养的，正如侵入人体的长绦虫一样。福楼拜曾经说过：“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换句话说，谁把这个美好而耗费精力的才能掌握在手，他就不是为生活写作，而是活着为了写作。”

这个把作家的才能比做绦虫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新意。通过阅读托马斯·乌尔夫（福克纳的老师，是两部巨著的作者：《时间与河流》和《天使望故乡》）的作品，我刚刚发现这个想法，是他把自己的才能描写成在心中安家落户的蛔虫：“于是，那梦想永远地破灭了，那童年时期感人、模糊、甜蜜和忘却的梦想。这蛔虫在这之前就钻进了我的心中，它蜷曲在那里，用我的大脑、精神和记忆做食粮。我知道，自己已经被心中的火焰抓住，已经被自己点燃的火吞食，已经被多年来耗费我生命的愤怒与无法满足的欲望铁爪撕得粉碎。一句话，我知道，在脑海里或者在心中或者在记忆中，一个发光的细胞将永远闪耀，日日夜夜闪耀，闪耀在我生命的每时每刻里，无论清醒还是在梦中；我知道那蛔虫会得到营养，永远光芒四射；我知道无论什么消遣，什么吃喝玩乐，都不能熄灭这个发光的细胞；我知道即使死亡用它那无限的黑暗夺去了我的生命，我也不能摆脱这条蛔虫。”

“我知道终于我还是变成了作家；我也终于知道了一个

人如果要过作家的生活，他会发生什么事情。”^①

我想，只有那种献身文学如同献身宗教一样的人，他准备把时间、精力、勤奋全部投入到文学才华中去，那时才有条件真正成为作家，才有可能写出领悟文学为何物的作品。而另外那个神秘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才能、天才的东西，不是以早熟和突发的方式诞生的——至少在小说家中不是，虽然有时在诗人或者音乐家中有这种情况，经典性的例子可以举出兰坡和莫扎特——而是要通过漫长的程序、多年的训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出现。没有早熟的小说家。任何大作家、任何令人钦佩的小说家，一开始都是练笔的学徒，他们的才能是在恒心加信心的基础上逐渐孕育出来的。那些逐渐培育自己才能的作家的榜样力量，是非常鼓舞人的，对吗？他们的情况当然与兰坡不同，后者是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是个天才的诗人了。

假如这个孕育文学天才的话题您感兴趣，那么我建议您读一读福楼拜的书信集，尤其是 1850—1854 年间他在创作第一部杰作《包法利夫人》时写给情人路易莎·科勒的那些信。我在写作自己最初那几部作品时，阅读这些书信让我受益匪浅。尽管福楼拜是悲观主义者，他的书信中充满了对人性的辱骂，他对文学却有着无限的热爱。因此他才把自己的才能表现为参加远征，怀着狂热的信念日日夜夜投身其中，对自己苛求到难以形容的程度。结果，他终于冲破了自身的局限性（这在他早期的文字中由于受流行的浪漫主义

^① 托马斯·乌尔夫：《一部长篇小说史——作家创作过程》，塞萨尔·莱安特翻译，马德里 pliegos 出版社出版，第 60 页。——原注